



论英国博物馆学史及“英国性”下的博物馆学

A History of British Museology or Towards a Museology of Britishness

大卫·弗朗斯¹ 著 王思渝² 阮可欣² 译

David Francis¹ Translated by Wang Siyu² Ruan Kexin²

(1.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所, 伦敦, WC1H 0PY; 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1.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London, WC1H 0PY;

2.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内容提要: 文章讨论了英国博物馆学的两大特点, 及其成因与影响。其一是将博物馆与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工具体主义倾向, 其二是收藏家的实用主义倾向, 重点关注实物收藏, 以及在艺术史或人类学语境下形成的话语系统。这两点都可视为对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博物馆学的回应。这一论断并不新鲜, 更广为人知是, 1989年《新博物馆学》(*The New Museology*)出版, 这一年被后人称作英国博物馆学元年。《新博物馆学》认为, 尽管博物馆工作者常将他们所面对的政策和工作程序视为理所当然, 但事实上, 他们的应对之法反映了潜在的价值体系, 这一价值体系又是机构灌输给员工的。文章还讨论了“英国性(Britishness)”这一概念, 对英国博物馆学是什么提出质疑, 同时探讨社会正义和去殖民化等当代议题的历史背景, 最后也将论及更为全面的跨文化英国博物馆学愿景。本文的核心在于, 博物馆学并不是简单的关于博物馆的研究, 而是正如布鲁诺·布鲁伦·索耶斯(Bruno Brulon Soares)继承了其先驱捷克博物馆学家兹比涅克·Z. 斯坦斯基(Zbyněk Z. Stránský)所谈的, 关于价值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价值既是指博物馆收藏和展示的实物的价值, 也是其揭示的使其得以存续的潜在文化的价值。

关键词: 英国博物馆学 英国性 去殖民化

Abstract: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re are two entangled threads that define British Museology. The first is an instrumentalist tendency connecting the museum with social reform and the second is a materialist pragmatism focused on the object collections at the expense of the discursive systems, such as art history or anthropology, they represent or the histories they are entangled with. Both of these qualities can be seen as a reaction to the museology of mainland Europe in terms of France and Germany. This diagnosis is not a new one but has been identified most famously in 1989 – a date that looms large as a year zero for British Museology due to the publication of a series of essays titled the *The New Museology*. This book holds that, though museum workers commonly naturalise their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as professional practice, the decisions workers make reflect underlying value systems that are encoded in institutional narratives. This essay approaches the question of



question of what British Museology is by first critically examining the concept of Britishness, then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behind the contemporary issues of social justice and decolonization in British museology, and finally, exploring what a more expansive transcultural British museology might look like. At the heart of this essay is the concept that museology is not simply the study of museums, but what Soares drawing on the work of pioneering Czech Museologist Zbyněk Z. Stránský, the study of value. This work not only in the sense that museums ascribe values to the objects they safeguard and display but also that they reveal the underlying values of the cultures that maintain them.

Key Words: British museology; Britishness; decolonization

一、什么是“英国性”

在充分讨论博物馆与社会公正和去殖民化这两个问题之前，有必要从地理界限和概念界限上讨论“英国性”的内涵。中国和德国都有讲述其国家故事的博物馆，与之相较，英国没有博物馆专门讲述英国史。不列颠博物院（又称大英博物馆）长期受到批评，学者认为其缺乏远见，因为它没有来自本国的收藏。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都有名为国家博物馆的机构，但在英格兰却没有。

为何用博物馆来体现“英国性”这么困难呢？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那篇标志性的文章《谁的遗产》（*Whose Heritage*）^[1]中（这也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作），他描绘了英国性的基本特征，却又解构了这一切，并追问英国性到底意味着什么。霍尔认为，作为民族国家的概念，英国是从18世纪以来相对新近的历史建构，其基础并不稳定。英国现在是一个囊括了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民族国家。

霍尔比较了作为民族国家的英国和作为帝国的英国，这二者曾被视为一体，人们认为英国具有巨大的海外财富和商业利益，而近年来，二者在人们

脑海中的联系渐渐不那么紧密。在英国，人们渐渐对大英帝国有选择性地失忆和否认，这表现为，将其表述为一种“外部附属物，外在于英国社会形成的历史和文化”^[1]。但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还不是这样。英国曾邀请各类移民，例如那些在1948年登上了“疾风号”甲板的移民^①，借此来填补其破碎的公共形象。移民到英国被表述为是一趟回到中心和家园之旅。尽管事实上，很多来自加勒比海和南亚的移民一经到达便在住房和工作机会上遭遇了可怕的种族主义和歧视。

自霍尔谈及“英国性”以来，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在一个全球化和去中心化的世界里，有人不断将英国错误地表征为封闭的、处境艰难的、自给自足的、有边界的、闭塞的小岛；这些人本想为自己的成功做好准备，却足以使其陷入致命的瘫痪。”2016年决定脱欧以后，在本质上，英国忽略了霍尔的主张。但是，本文想谈的是，“英国性”这一覆盖面极广的概念如何帮助英国博物馆学应对其最主要的挑战，即去殖民化和文物返还。

法国的案例颇有参考价值。意识到英国博物馆学与法国博物馆学在历史上的对照关系是极为重要的，“法国性”便没有仅局限在地理上的法国大陆^[2]。例如，法国的海外省，南美的法属圭亚那便与法国

① 译者注：二战结束后，英国本土遭遇严重破坏，劳动力短缺，于是向其殖民地和前殖民地招募了大量劳工到本土填补劳动力缺口。“疾风号”是这波移民大潮中担任运载人力的船只之一，也是第一艘开始运载外来劳动力的船只。1948年6月22日，疾风号运载492名来自牙买加等加勒比地区的劳工及其子女来到英国。



大陆上13个地区一样，受到平等对待，同样参与法国和欧盟的选举。这并不是在美化法国的博物馆学模式。索菲亚·拉巴迪（Sophia Labadi）曾为国家移民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Immigration History）做过关于罢工工人的民族志研究^[3]，其成果表明，法国博物馆学在面对自身的殖民历史和移民问题时，与英国类似。但是，在其他方面，法国博物馆学有助于我们考虑“英国性”这一概念是否可能走出国境。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4]一书中讨论了民族国家理念得以形成的历史背景，而我则希望在全球化的范畴中重新讨论英国性，并由此催生出有意义的概念和框架重构。在此，可以类比王铭铭对“天下”的讨论，这个词原本指的是皇帝的统治，但在王铭铭的论文中用来表达介于国家和全球之间的一种状态。在这一状态下，不同的文化都可以共同被呈现。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和迈克尔·罗兰（Michael Rowlands）^[5]借助“天下”一词的兼容性来讨论文明概念，并且将此和欧洲在殖民掠夺过程中使用的“文明开化”等带有轻蔑含义的词语区分开。与之相较，我认为，英国博物馆学的“英国性”也适用于那些曾经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国家。这样能够确保对英国博物馆学史的讲述更为辩证，其叙事也不会成为殖民者的独白。这可能会引发争论，但我想说的是，就像贝弗利·巴特勒（Beverly Butler）^[6]讨论文化遗产的时候所谈的，“英国性”既是毒，也是药。它一方面指代着英国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也拉平了等级、模糊了区别。在这一定义里，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英国性”一词，无论他们是否被殖民还是移民到此。这反过来影响了对博物馆物件所有权和物件展示的研究与实践。与此同时，“英国性”的定义并不是孤立的，其考虑了法国、德国和北美博物馆学的背景和其研究的再度兴起。我也将在最后谈到中国的案例研究。

二、1988—1989：《新博物馆学》出版及其他

在讨论了“英国性”一词后，有必要重温英国博物馆学诞生的时刻。英国最为重要的博物馆民族志作者麦夏兰（Sharon MacDonald）认为，这是一场发生在南肯辛顿的文化革命——在十余年后，麦夏兰回顾了1988年发生在伦敦科学博物馆（London Science Museum）的事件：那时，抱着消费主义心态，保守党政府开始征收国立博物馆的门票。此前博物馆更近似于大学，被看作知识生产的场所，如今却被视作为大众，或更广泛地说，为市场服务的机构。这使英国的博物馆愈发面向观众，借鉴了北美博物馆学的许多模型与策略；而与此同时，鉴于自由市场法则，其愈发依赖于消费者以及政府的资金投入。

与此同时，在展览路（Exhibition Road）对面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简称V&A）中，艺术史家彼得·弗格带领一群艺术策展人和大学教师，主办了一系列的工作坊，最后形成了《新博物馆学》^[7]一书，其中收录了9篇论文。学者多认为，《新博物馆学》重新思考了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在过去很多时候被认为是理所应当，如博物馆的目的、收藏的起源、博物馆的社会目的以及博物馆中观众的角色^[8]。然而，如果把《新博物馆学》当中的宣言过于当真，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英国，对观众的关注度提升和实物中心地位的下降，这在罗杰·迈尔斯（Roger Miles）在自然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所做的阐释和评估工作^[9]，甚至早在19世纪在利物浦博物馆（Liverpool Museum）所开展的观众调查当中都能看到。

在国际博物馆界，《新博物馆学》常被批评过于强调英国和北美，它所谈的许多建议，例如博物馆的社会目的等，在欧洲大陆早有讨论^[10]，如捷克博物馆学家兹比涅克·Z. 斯坦斯基（Zbyněk Z. Stránský），还有南美的一些学者，也曾讨论过这些问题^[11]。因此，我们可以谨慎地说，不同博物馆语



境下，新博物馆学有着不同的关注重点。在《新博物馆学》出版之前，1984年，魁北克会议已讨论过新博物馆学的概念^①。

尽管如此，对《新博物馆学》一书的讲述和1989年可以被视为一个节点：从此出发，我们追溯17、18、19世纪的博物馆与社会和民主变革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后疫情时代英国博物馆学内部关于去殖民化和何为英国之地的当代批判性争论。更为广泛的，在话语层面上，我们可以借此看到博物馆学内部的争论是如何在相关学科中得到响应的，即批判遗产研究或者记忆研究如何看待当下的历史叙事方式^[12]。博物馆研究因其在藏品来源问题上的纠葛（以及偶尔对这些纠葛的敌意）而较为独特，拥有一条独特的话语路径。

三、博物馆与社会公正

在民族国家范畴下，“英国性”所体现的博物馆角色，尤其是其社会角色，可以被视为新博物馆学的核心。我认为，英国博物馆学的核心关注点在于，从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出发，关注博物馆的社会功能价值——这也是与德国和法国博物馆学的明显不同之处。这种关注社会功能的视角类同于北美博物馆学。然而，即便20世纪的英国博物馆学深受北美的影响，但是，北美和英国的博物馆学之间有两点明显的不同：其一，诸如大都会、盖蒂等机构的慈善资金模式使得北美的机构与国家政策之间保持着更为独立的关系；其二，美国本身是由殖民者组成的国家，这使得当地的博物馆学与它的原住民关系密切，而这一点在英国是不存在的——尽管英国博物馆学也需要面对诸如威尔士人、苏格兰人或者从之前的殖民地过来的移民等少数族裔的问题。

这种差别，以及德国和法国对待此问题的方式，将会在下文讨论去殖民化问题时进一步展开。

要想了解“新博物馆学”一词的含义，就必须知道什么是旧博物馆学，旧博物馆学主要的支持者是谁。巴特勒^[13]经常借用杰曼·巴赞（Germain Bazin）^[14]关于旧博物馆学的表达作为例子：巴赞将鉴赏和博物馆结合在一起，认为随着亚历山大博物馆被当作缪斯神庙，时间被概念化了。常与卡尔·弗里德里希·辛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的柏林老博物馆设计并提的，这种将希腊和罗马视为博物馆起源的观点在今天英国博物馆的宏伟建筑中仍能看到痕迹。罗伯特·斯米尔克（Robert Smirke）提到，大英博物馆的设计经常被视作将博物馆视为希腊神庙的第一次表达。正如伊恩·詹金斯（Ian Jenkins）^[15]所指出的，19世纪的英国、法国、德国都将博物馆建筑建成希腊和罗马神庙的样式，其古典雕塑收藏也契合了这一古老的建筑形态，在这当中，欧洲依靠体现古老地中海文明的建筑形态和智慧传说彰显着自身的力量。需要记住，在19世纪，学者们熟知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两种语言传承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即使这些语言在今天已经很大程度上被欧洲所遗忘。

在继承知识遗产的同时，宣称自己是地中海世界的继承者还带有强烈的政治动机，这一点在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达到顶峰，他有意将自己定位为亚历山大大帝的接班人。和他的军队一起，拿破仑带去了大约160名学者来记录古埃及历史，最终形成了著名的出版物《埃及记叙》（*Description de l'Égypte*），并掠夺及购得古埃及文物充实法国博物馆。英国随后亦获得了古埃及、希腊及罗马藏品，如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著名罗塞塔石碑，即战胜法国后从其手中夺取的。事实上，一批藏品的获

① 译者注：1983年，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ology, ICOM）的年会上，加拿大学者皮埃尔·梅朗德（Pierre Mayrand）首次提议在委员会内部设专门的工作小组，致力于社区博物馆学（Community Museology）的研究，但这项提议未能通过。出于对委员会消极回应地不满，1984年，加拿大博物馆学界在魁北克组织了第一届“生态博物馆和新博物馆学国际工作坊（L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Ecomusées et nouvelle Muséologie）”，并将他们的主张发布在《魁北克宣言》（*Declaration of Quebec*）中。



取，诸如卢浮宫的《米洛的维纳斯》、大英博物馆的帕特农神庙石雕；及其相应的学者们的研究，例如法国的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和英国的托马斯·杨（Thomas Young）破解象形文字的竞赛；都应该被视为欧洲国家之间争夺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表现。需要注意，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学》（*Orientalism*）当中便将《埃及记叙》看作现代东方主义的起点，其借助知识的获取和话语的生产形成对非欧洲地区的控制。

与此同时，虽然上述这些广为人知的故事是与英国博物馆学史最直接相关的，但这些故事实际上忽略了这一事实：英国第一所拥有藏品且面向普通人开放的机构，并不是这些古典神庙，而是中世纪的哥特教堂。事实上，这些教堂一直拥有它们自己的珍奇屋，例如坎特伯雷的约翰·巴格罗夫（John Bargrave）珍奇屋^{①[16-17]}。一方面，这与作为理性化产物出现的世俗博物馆直接相关；另一方面，正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因为物的功能可见性（*affordances*）和灵韵（*auratic quality*），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英国博物馆学^[18]。事实上，在许多教堂，圣髑盒的藏品都在英国教堂改革的浪潮中被破坏掉了，这不是轻视实物，也不是反实物的立场，而是与对观众的考虑有关；同时也与对待文物归还的态度相关。

例如巴格罗夫的收藏便是重要的，因为他们是博物馆从社会当中脱离出来但又和个人以及宇宙观结合在一起的那一时期的典型。物品通常被分为自然物和人造物，这既体现了天主教世界观下的宇宙观，又记录了物品所有者获取物品的个人史^[16-17]。这些物品与其所有者的关系类似于中国的金石学传统：中国文人在雅集中展示收藏，以飨同好。这种类型的展示日后逐渐变得公共化，这种趋势对于英国博物馆学来说是重要的，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诸多问题。法

国和中国的国家收藏，以卢浮宫和故宫为代表，最初都是皇家的私人收藏，在突如其来的革命后，藏品从私人变公有，这一过程恰好说明了这些革命以人为中心的性质。革命催生了民族国家，皇宫转变为公共博物馆，这意味着之前的统治者及其亲属将很难重返这些空间。

英国公共博物馆的发展与此不同，英国经历的是改良而非革命。大英博物馆的建立并不来自于皇家收藏，而是汉斯·斯隆（Hans Sloane）的个人收藏。汉斯·斯隆的职业是一名医生，在牙买加一个甘蔗种植园工作，他的藏品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和伊丽莎白·兰利·罗斯（Elizabeth Langley Rose）的婚姻，他的妻子是牙买加甘蔗种植园的继承人^[19]。在他死后，他将私人藏品留给了国家：它应该“被所有想要看到这些物品的人所参观”，并且“变得尽可能有用，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或者是增进所有人的知识”。

如何使藏品的公开度达到斯隆的要求，这给英国国会带来了难题。斯隆的朋友和熟人还在要求国会执行他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通过了《1753法案》，要求“建立一个面向所有后代开放、只要好学有兴趣便可以免费进入的整体贮藏室”。尽管按《1753法案》要求，博物馆免费向所有人开放，但是，当时仍然有诸多入馆限制。博物馆在周末和周中的非工作时间是不开放的，因此，它实际上拒绝了工薪阶层参观。当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两票系统，参观者需要在第一次参观时预订下一次的门票；当其进馆后，会在向导的带领下快速参观，而非自由愉快地随意参观。拿破仑用一年的时间将卢浮宫转变为人民广场^[20]，大英博物馆却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直到1879年，才从周一到周六都保持开放，周日开放甚至推迟到了1896年。

在19世纪，大英博物馆在开放问题上进展缓慢，这对英国国内各种博物馆的建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845年的《博物馆法案》（*Museum Act*）

① 译者注：约翰·巴格罗夫是17世纪的一位英国牧师和法学家，以对坎特伯雷大教堂的研究而闻名。他也是一个收藏家，其珍奇屋位于坎特伯雷大教堂中，收藏了其游历欧洲期间收集的物品。



指出，大型城市中心的市政议会会有权建立博物馆。正如凯特·希尔（Kate Hill）^[21]所指出的，在城市快速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人们认为博物馆对改善工薪阶层的社会地位有着持续的积极作用。工薪阶层被带到中产阶层的世界中，成为了日渐发展的宪章运动的捍卫者。与此同时，博物馆在艺术史、考古学等学科的学术话语建构时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博物馆中，学者像测绘地图一样，以物质文化为基础，勾勒了知识和文化欣赏的方式^[22]。澳大利亚博物馆学家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23]认为，隐藏在此背后的是一种紧张关系，博物馆既试图“无差别对待全体市民，将他们纳入知识—权力关系”中^{[23]98}，又借由艺术史、人类学等学科学术话语的生产不断使“人口差别化”^{[23]99}。本尼特进一步指出，这种19世纪的博物馆公共概念时至今日仍影响着博物馆。

上文讨论了19世纪英国博物馆学的社会工具主义价值观，下文将讨论其如何在英国博物馆学理论（尤其以博物馆研究的莱斯特学派为代表）以及博物馆实践中体现出来。社会工具主义价值观可以被理解为北美建构主义学派和法国后结构主义对英国博物馆学所造成的外部影响所引发的紧张关系。

建构主义学派的代表是美国博物馆教育学家乔治·海因（George Hein），他继承了约翰·杜威（John Dewey）^[24]的实用主义哲学。约翰·杜威在20世纪的上半叶将自由选择式的教育、民主与美国的社会变革结合在了一起。海因认为，博物馆在举办展览和各类项目时应该鼓励参观者生产出自己的意义，而不是仅作为被动的参观者，在消费博物馆策展人呈现的叙事。海因的立场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他改良了只鼓励被动参观、不质疑权威的线性叙事展览；相反，他认为，没有固定展线，鼓励参观者自我建构意义的展览，能够鼓励更为主动的参观者，让博物馆成为一个建构主义的、更加民主的空间。这种建构主义的路径对北美，以及英国博物馆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对那些带有互动要素的科学博物馆^[25]。它也影响了观众研究的出现，建构主义视角下，研究者乐观地认为，参观博物馆

所获取的知识是可以被证实的，这可以用于衡量并提升博物馆的效率^[26]。

与之相对的，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通过对欧洲艺术博物馆的研究指出，只有具备高文化资本、接受过良好教育、家庭具有艺术背景的参观者，才有可能在艺术殿堂中漫游，而那些低文化资本的参观者则需要依靠博物馆阐释和线性的叙事路线。布迪厄研究的核心在于“惯习（habitus）”，一种能够影响人们行为和思考的社会化了的常态或者趋势。“惯习”曾经被用来探讨为什么即便英国的博物馆已经免费开放百余年，其参观者仍然主要是白人和中等阶层。由此，产生了这样的议题，按照建构主义者的观点，参观者的身份是流动的，其身份随着参观语境的不同而变化，这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群体关系密切：同一个人也会有不同的身份，他们与亲人、朋友或独自来参观博物馆时，行为不同，那么，我们在谈及观众身份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27]？相应的，布迪厄的追随者们会强调种族、阶层、取向、身体能力等的固定性，博物馆的叙事和建筑在有意无意间排斥了特定的参观者。

这构成了英国博物馆研究的背景脉络，在莱斯特博物馆学派的倡导下，英国博物馆学开始探索博物馆与社会公正的关系。这一运动背后的动机是让博物馆不再那么精英主义，而成为社会包容的机构，表达社会宗旨^[28]。这一动机的基本前提是，在社会层面处于弱势的个体正遭受着家庭、社群和国家的孤立，“不被允许完全地介入社会的不同系统”^[28]。理查德·桑德尔（Richard Sandell）认为，虽然博物馆传统上是精英主义的、排斥性的机构，但是“他们也具备重新纳入和整合那些被排斥了的人的能力”。博物馆能够成为“社会机构”，承担“社会责任”，这已经不仅是学术层面的号召，而且成为博物馆协会提出的英国博物馆使命的一部分：博物馆有责任与社区共同克服贫穷、排斥等挑战，并获得平等。

在这种强调博物馆作为体现社会公正机构的理念中，其核心是社区的角色和排斥的概念。毕竟，



所谓社区，本身就是因与其他社区相互排斥而形成的^[29]。“其他社区”可以被理解为主流的、通常的、大多数的群体。社会排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包括年龄、民族、宗教、取向和社会阶层。这里，运用社会公正机构的概念推动博物馆里的社区参与和利益相关者融入。社区参与这种方法受北美博物馆学家尤其是妮娜·西蒙（Nina Simon）的影响很重。在她的代表作《参与式博物馆：迈入博物馆2.0时代》（*The Participatory Museum: Entering the Era of Museum 2.0*）^[30]当中，西蒙提出参与的谱系，其中包含了从咨询到共创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参与。凯特·麦克斯威尼（Kayte McSweeney）和珍·卡瓦纳（Jen Kavanagh）^[31]提出了适用于英国语境的相似的参与维度。他们将社区参与可视化作为阶梯图，分为三个阶段：不参与、表面参与和市民权力。在这当中的核心在于，参与的真诚，参与“应该对参与者和机构而言双向受益，并且大家可以共同创造或者做一点事”。这也是对市民参与的想象——所谓市民，要成为社会的一员，并强调，社会应为其提供权力和掌控力。

权力分享或交接的挑战以及共同决策能力的培养，导致策展人传统角色的转变，并催生了社区参与顾问等新角色。伊丽莎白·克鲁克（Elizabeth Crooke）指出，“不熟悉社区实践要求及其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博物馆策展人，不得不寻求发展相关项目的方法。有些策展人并不认为这种项目与博物馆职业工作有关，而将其视作社会工作”^[32]。

典型的，越是以本地为核心的小博物馆、社区博物馆，越认为参与式实践是一种天然所需^[33]，例如伦敦的哈克尼博物馆（Museum of Hackney）、德比博物馆与美术馆（Derby Museum and Art Gallery）。国立博物馆对社区参与的批评主要在于认为它是次要的，当面对财政危机的时候，这是可以被首先放弃的。塞蕾娜·伊尔沃利诺（Serena Iervolino）^[34]认为，首要的是使合作性工作从边缘回到中心——从由机构的“软

端”如观众部、教育部等，转移到由机构的“硬端”如策展部、收藏部等负责。

与此同时，英国财政紧缩，博物馆的社会角色可以用来证明政府开支用在他们身上是正当的。劳拉·クロス利（Laura Crossley）认为，“社区长期参与实践的关键便在于博物馆从业者和部门领导者相信博物馆的社会职能、合作工作模式、机构政策，同时重视社区参与，而且地方和国家政策能够保障社区参与实践”^[35]。

上述关于英国博物馆的角色和社区参与的讨论在ICOM博物馆新定义的争论中得到了体现，2022年，在布拉格会议上，博物馆定义被修订为：“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

事实上，定义中关注社区的内容在2019年的ICOM京都大会上曾被拒绝过，在发布之前也一直在修改。这反映了以社区为主的博物馆理念在持续发展，但也面临着曲折和挑战^[11]。如果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自新博物馆学提出之后，博物馆与社会公正的争议一直占据着英国社会的主流，那么，2018年以后，关于英国博物馆学的讨论便主要围绕着去殖民化。这种争论表明，社区参与并不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例如，文物返还、去殖民化等问题如今开始困扰英国博物馆学了。这便与我们所要谈的英国性的概念纠缠在一起了。

四、去殖民化：敬拜祖先，与幽灵同在

二战后，大约20世纪50年代，随着英国迎来英联邦的移民潮^①，爱丽丝·史蒂文森（Alice Stevenson）注意到，从那时起，地方博物馆对于埃及考古学的态度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转变^[36]。在此之前，古埃及的出土文物曾是博物馆的热门收藏对象，如今却遭到博物馆馆长的冷落，考古学家甚至

① 译者注：1948年，英国颁布了《国籍法》，承认所有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公民有英国公民权，鼓励他们移民英国本土。此后，大量外来移民从英联邦国家及地区迁入英国。



很难为其找到归宿。相反，这些地方博物馆——其中许多是为了响应1845年“博物馆法案”而创建的，曾按照大英博物馆的微缩版来构想——转而致力于展示本地考古和自然历史。这可以看作是对大英帝国记忆遗忘的开始。霍尔认为，对帝国记忆的遗忘是当代英国性定义的核心，也标志着英国博物馆学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1]。

关于帝国遗产，英国博物馆学中最突出的议题便是文物返还问题。这并非新现象，自海外文物进入英国博物馆收藏以来就已存在。拜伦曾因帕特农石雕被埃尔金勋爵（Lord Elgin）从神庙中移走在大英博物馆展出而写下著名的诗句：“麻木不仁的是那些不掉泪的眼睛。看着英国人的手破坏你的城墙，搬走你残破的神坛。”^[37]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帕特农神庙雕塑的返还问题愈演愈烈，希腊文化部部长梅丽娜·梅尔库里（Melina Mercouri）呼吁归还这些文物^[38]，这一行动促成了2009年雅典卫城博物馆的落成^[39]。

作为对这些批评的回应，英国的国立博物馆与其他欧美博物馆建立统一战线，强调“普世性”或“百科全书式”博物馆的价值。这一立场在2002年的《关于普世性博物馆的重要性与价值的宣言》（*Declaration of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Museums*）以及洛杉矶盖蒂博物馆（The Getty Center）前馆长詹姆斯·库诺（James Cuno）的著作^[40]中得到了体现。库诺试图论证博物馆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概念，而是为世界上所有国家保存世界的文化。此观点遭到了肯尼亚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s of Kenya）前馆长乔治·阿邦古（George Abungu）的批评，他问道：“为什么所有这些‘普世性博物馆’悉数建在欧美？”^[41]他进一步指出，博物馆的“普世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立场，自有其历史渊源和政治背景。所谓的“普世性博物馆”力争保护的并不是世界的遗产，而是它们自身的遗产。欧美博物馆对此的回应是将自我描述从“普世的”改为“百科全书式的”——这一转变象征着对康德及狄德罗时代前民族国家思想的回归。

这一局面在2020年左右的新冠疫情期间发生

了转变，当时一群支持“黑人人权（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抗议者在英国布里斯托尔推倒了奴隶贩子爱德华·科尔斯顿（Edward Colston）的雕像，并将其丢入布里斯托尔港口^[42]。这一事件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隐匿于众目睽睽之下的奴隶制遗存，那些竖立在公共场所的纪念碑和雕像突然成为焦点——幽灵重现了！这种转变在博物馆中首先体现在创始成员的雕像被“推倒”，例如大英博物馆的创始者汉斯·斯隆和伦敦达尔斯顿的家庭博物馆（Museum of the Home）的创始人罗伯特·杰夫里（Robert Geffrye）。其背后的动力可以追溯到2020年5月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遇害后北美愈演愈烈的“黑人人权”运动，以及2018年提出的呼吁归还非法入藏法国的非洲文物的《萨尔·萨沃伊报告》（*The Sarr Savoy Report of 2018*）。

在英国，与这些抗议行动同时，一系列关于博物馆藏品和建筑遗产背后殖民遗产的重要著作面世。其中包括詹姆斯·德尔布尔戈（James Delbourgo）的关于奴隶制如何促进汉斯·斯隆收藏的重要研究^[43]；科琳娜·福勒（Corinne Fowler）的《绿色不悦之地》（*Green Unpleasant Land*）^[44]揭露了殖民主义与英国乡村房屋的关系；以及丹·希克斯（Dan Hicks）的《野蛮博物馆》（*The Brutish Museums*）^[45]讲述了英国军队掠夺贝宁青铜器的过程并呼吁文物返还。这些书籍唤醒了英国殖民主义的幽灵，至今，殖民主义仍困扰着英国的博物馆收藏，对博物馆只需向所有人开放即可实现社会公正的观点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相反，这些论著质疑博物馆存在的正当性，或博物馆及其藏品是否需要被彻底废除。

与去殖民化辩论相关的一个有价值的案例，是19世纪与人类学学科一同发展的一种博物馆类型，经常被称为“民族学博物馆”或“民族志博物馆”，但亚当·库珀（Adam Kuper）巧妙地将其描述为“他者博物馆”^[46]。在这里，“他者”指的是非欧洲人及非白人群体。如今，人类学学科遭遇的“表征危机”，欧美人类学家描述非欧美人生活的合理性受到质疑，这些欧洲的“他者博物馆”



也遭遇了如何表征殖民时期收藏的非欧洲物质文化的危机。罗宾·博斯特（Robin Boast）^[47]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将博物馆视为“接触地带”，不同的社区可以在其间彼此联系、对话，尽管其权力地位迥异。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将博物馆看作是一个场所，在此，历史上不同的博物馆学话语与叙事得以交汇。借用俄罗斯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术语来说，博物馆最接近“复调（heteroglossia）”——在这个空间里，主导叙事和反叙事的多种声音都可以共存。这些处于边缘又苦苦求生的博物馆，也是最具争议性和不稳定性的博物馆，恰恰提供了一个识别各国博物馆学特征的理想场所。英国博物馆并不是唯一面临这些批评的博物馆，法国和德国的博物馆都遭遇了同样的批评，但其回应的方式却截然不同。三国各自的回应，鲜明体现了其博物馆学的独特特点。因此，有必要概述法国和德国博物馆学在其实践中所表达的立场，以此来凸显英国博物馆学的特质。

回顾触发博物馆去殖民化运动的因素之一，尽管《萨尔·萨沃伊报告》出自法国，但它也遭到了反对的声音：诸如布朗利河岸博物馆（Musée du Quai Branly）馆长斯蒂芬·马丁（Stephane Martin）等人认为，这份报告“过分强调了历史赔偿，而否定了博物馆的贡献”。博物馆在法国的人类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诸如保罗·里维特（Paul Rivet）、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等知名人类学家直接参与了人类博物馆（the Musée de l'Homme）的创建和管理。人类博物馆影响了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马蒂斯（Matisse）、布朗库西（Brancusi）和德兰（Derain）等现代艺术家，也因此推广非欧洲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6]。这种影响在2006年布朗利河岸博物馆的创建过程中达到顶峰，该馆将史前文物与民族志收藏分离，并以日益美学化的方式展示它们。博物馆由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遗产捐赠而建立，这一事实证明了非欧洲物质文化在法国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在媒体的批评声中，法国对去殖民化讨论的回应也可以在常设展览中看到，例如，布朗利河岸博物馆的马可·拉德莱·德·拉夏里埃（Marc Ladreit de Lacharrère）收藏通过独特的法国艺术史视角，聚焦于36件非洲艺术品。该展览的策展与设计体现了法国对非洲艺术的美学态度，堪称法国人写给非洲艺术的情书。这些艺术品陈列于玻璃柜中，展现各种不同寻常的造型，美轮美奂，参观者能深入研究每件雕塑和面具的来源。除了马可·拉德莱·德·拉夏里埃收藏体现的美学方法外，还包括“桑戈尔与艺术：重构普遍主义（Senghor and the Arts: Reimagining Universalism 2023）”这样的临时展览。该展览探索后殖民时代塞内加尔和法国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艺术如何助力20世纪60年代的泛非运动。有批评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将物质文化从其原始使用功能中剥离出来^[46]，并掩盖了法国社会对非洲侨民成员固有的歧视^[48]。尽管如此，它清楚地表达了法国人对这些物件在法国博物馆中价值的认识。

法国的做法在许多方面可以与德国直接形成对比。首先，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德国在行政上比法国要分散得多，因此它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分别体现在其主要城市的多个博物馆中。其次，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所在国，法国一直是普世性文化路径的主要倡导者；而德国则发展了一种能够正视法西斯主义与大屠杀的历史路径，这种方法体现在德国的纪念文化（Erinnerungskultur）中^[49]。

自21世纪初以来，这种反思纳粹历史的方法已经应用于处理德国帝国遗产，特别是其非欧洲的物质文化收藏^[50]。洪堡论坛（Humboldt Forum）在柏林的发展促成了这一进程。将曾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民族志收藏搬到这样一个象征德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建筑里，这一决定引发了众多反对声音，并促使博物馆界深刻反思^[51]。在此必须强调，这些收藏曾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类学收藏，其主要倡导者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不仅在推动文化研究中的非种族取向方面影响深远，还培养了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等知名学者，



后者进一步形成了北美以立体模型为基础的人类学收藏方法^①。然而，德国没有赞颂这一遗产，而是直面这些文物入藏德国博物馆的殖民历史和德国对他国的掠夺。德国承认了过去的错误，并努力纠正不公正。在这一立场下，德国成为首个将文物归还非洲国家（如贝宁）的欧洲国家。

将法国和德国的博物馆学与英国的博物馆学进行比较，最明显的区别首先是英国缺乏可以相提并论的重要人类学博物馆。英国博物馆在非欧洲收藏方面展现出的创新性与变革性优势，在小型的、地区博物馆处理其散居的全球多数民族文化中有所体现，但并未触及英国在世界舞台上与非欧洲国家关系中的核心叙事。

通过回溯英国博物馆学中对非欧洲文化的博物馆学研究方法的转变，我们不仅能体会到其对英国博物馆学的重要影响，还能发现英国博物馆学在宏大叙事上的缺失。19世纪中叶，非欧洲物件被分配到一个单独的展室，1842年出版的《大英博物馆概览》（*Synopsis of the Contents of the British Museum*）将该组收藏描述为“一组世界较原始地区的人工珍奇品”，这反映了这些藏品的地位。在大英博物馆内，这些物品被认为是“文明进步”的宏大叙事的一部分^②。这一叙事也体现在大英博物馆入口上方的三角楣中，雕塑家理查德·韦斯特马科特（Richard Westmacott）^③以同样的标题为之命名。三角楣描绘了人类从最初的“原始野蛮状态”，逐渐通过宗教、艺术和科学的影响，走向“开化”^④。这一叙述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将非欧洲人置于文化成就等级阶梯的底层，二是如斯蒂文·哈雷尔（Stevan Harrell）^⑤指出的，这些藏品因殖民掠夺而入藏，为殖民主义辩护就成为博物馆的使命。在这一叙事中，通过与观众的关系暗示了

博物馆的角色。观众被引导穿越博物馆走廊进行一场自我教化之旅，最终在韦斯特马科特山墙末尾的人物处得到启蒙：他斜倚着，脚边躺着被驯服的大象和狮子，象征着对周围世界的主宰。

当然，观众的实际体验有所不同，甚至到了19世纪60年代，自然历史收藏迁往南肯辛顿后，非欧洲物质文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展厅时，它们仍然不太连贯。这些展品位于41号至52号展室，以大致的地理位置排列，密集地陈列在紧凑的展柜中^⑥。展品太过于拥挤，以至于据说雅各布·爱泼斯坦（Jacob Epstein），一位经常参观非欧洲藏品寻求灵感的雕塑家，以一个来自太平洋地区的、外表引人注目但罕见的装饰有两只鸟的碗为灵感创作了一件作品，并没有意识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碗，而是多个摞在一起的碗^⑦。

缺乏系统的展示模式，将尽可能多的物品放在一个展柜中，这种做法受到了皮特·里弗斯（Pitt Rivers）的批评。他是英国另一个主要的人类学博物馆——皮特·里弗斯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的创始人，该博物馆最终落户牛津。他宣称，尽管大英博物馆收藏与展示的方法有助于专家的研究，但对大众的教育却毫无用处^⑧。他将大英博物馆混乱的展示与他自己的类型学体系进行了对比，他用标本来表明教学序列，显示出某些形式在其发展顺序中必须先于或紧随其他形式。用皮特·里弗斯的话来说，类型学“形成了一棵进步的树，并将主干与次要的分支区分开来”。支撑里弗斯“进步之树”的，是一系列认为技术发展促进种族进化的假设，随着20世纪早期博厄斯等人所倡导人类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出现，这些假设受到了质疑。

1970年，大英博物馆的民族志收藏被移至皮卡迪利伯灵顿花园一个专门建造的机构，命名为人类博物馆（Museum of Mankind）。在这里，收藏以立体模

① 译者注：博厄斯主张在博物馆展览中，使用立体模型来展示不同文化的日常生活和习俗，将原住民的文化置于其日常生活的背景中，使观众能够更直观地理解这些文化。

② 译者注：这一展示方式具有收藏策展人奥古斯特·弗兰克斯（Augustus Franks）标志性特点。奥古斯特·弗兰克斯是大英博物馆的第一位策展人，负责英国和中世纪古物以及民族志收藏。他所负责的展览，展品往往按照地理位置进行排列，以有助于观众理解不同地区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差异。



型的形式展示——这一展陈方式深受博厄斯在北美使用模型和假人模特的布景方法的影响，旨在凸显物件与人及其使用情境之间的关系^[57]。这种在展览中使用布景和立体模型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创新，也为更多同类型的试验提供了机会。然而，其展示也因使用模拟场景而受到批评，备受争议，批评者认为布景和模型误导观众，强化了观众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令人联想到19世纪的人类动物园。

1997年，书籍和手稿收藏迁至新落成的大英图书馆，民族志收藏的非洲部分随后回到大英博物馆，它们再次被赋予了新的叙事视角，就像在巴黎的布朗利河岸博物馆一样被视为艺术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艺术家爱泼斯坦和亨利·摩尔（Henry Moore）的影响，大英博物馆的民族志收藏曾为其带来创作灵感。将非洲物品重新定义为艺术品是一种策略，其背后显示了策展人试图回避收藏来自于殖民地的掠夺这一事实，如皮特·里弗斯收藏等。将当代非洲艺术家的作品穿插在原始收藏中，试图调合展览，让策展声音退居幕后^[58]。

然而，将非洲收藏重新归类为艺术品也有其问题，例如，在展览赞助委员会中，塞恩斯伯里（Sainsbury）将非洲物件与“原始”对摩尔和爱泼斯坦等现代主义雕塑家的影响联系起来：我是一个喜欢原始主义的艺术家，也受到了原始的影响……我喜欢亨利·摩尔的雕刻——亨利·摩尔喜欢原始^[58]。

尽管“原始”这一受到争议的术语后来被策展人删除了，但画廊中充满种族意味的言论仍然存在于以材质分类来组织展厅的方式中，这与19世纪民族志展览的类型学方法颇为相似。此外皮特·里弗斯最初对博物馆非洲藏品排序混乱的批评也得到了卡罗琳·迪安（Carolyn Dean）的响应。迪安认为，将这些物品归类为艺术品剥离了它们的使用背景和历史语境。她进一步指出，按照材质主题来组织展

厅，实际上呈现了一个缺乏历史的非洲形象^[59]。这一批评针对的是1997年设计的展示方式，而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展示方式基本未变，批评依旧有效。与法国或德国不同，英国博物馆学未能构建出一个宏大叙事来阐释其对非欧洲文化的记忆、态度和价值。这种集体失忆，缺乏宏大叙事的能力，以及自我表达的无能，依然是英国博物馆学中令人遗憾之处。

五、跨文化的英国博物馆学——思辨博物馆学

“英国人的问题在于，他们的历史发生在海外，因此他们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撒旦诗篇》（*Satanic Verses*）中的一个角色如是说^[60]。同样的话也适用于英国博物馆学史——仅仅讲述发生在英国本土的英国博物馆学史，就等于忽略了一半的故事。本文之所以主要聚焦于此，是因为要将全球不同地区的博物馆学汇聚成篇并使之对话，需要浩繁的学术工作，这将是未来英国博物馆学研究的任务。本文最后从中国新旧博物馆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一点，作为构建更为跨文化的英国博物馆学体系的一个片段，这一体系在与多元文化的对话中逐步接近霍尔所提出的“英国性”概念的重塑。

在探讨贝宁青铜器归还问题时，希克斯^[45]呼吁建立一种“盗窃理论”，以理解他标题中的“野蛮博物馆”。这引导我们关注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及其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中探讨的“互惠（reciprocal giving）”概念，该概念与博物馆收藏息息相关^[61]。马林诺夫斯基将特罗布里恩德岛民交换的库拉物品与苏格兰爱丁堡城堡中的王冠珠宝相提并论^①。他指出，无论一件物品多么丑

① 译者注：库拉是一种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进行的复杂而大型的社会制度，涉及贝壳臂镯（mwali）和贝片项圈（soulava）的交换。这种交换不仅仅是物品的简单流通，它还承载着社会关系、信任机制和文化符号的重要作用。马林诺夫斯基将库拉物品与苏格兰爱丁堡城堡中的王冠珠宝相提并论，主要是强调库拉物品的社会和文化价值。正如王冠珠宝在现代社会中象征着权力、地位和历史，库拉物品在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社会中也具有类似的象征意义。

陋、无用或毫无价值，“只要它曾在历史场景中出现，并曾被历史上的人使用过……它对我们来说就必然珍贵”。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库拉圈与博物馆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库拉物品仅能暂时拥有，而欧洲人必须在博物馆永久保存这些物品才能体现其全部价值。对于库拉圈而言，其价值在于交换本身，借此，我们得以重新想象一种更全面的英国博物馆学：不仅是物质文化间的转移，还有不同文化间对概念与设计的交流。

通过库拉圈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与另一种文化比较，我们得以反观自身。同样，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描述自己20世纪初在中国的历时，也阐述了跨文化思考的价值。

将异域文化与自身文化相比较时，人们不得不追问：我最终珍视的是什么？是什么让我认为一种社会比另一种更可取？我最希望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什么样的目标得以实现^[62]？

露西·邦德（Lucy Bond）与杰西卡·拉普森（Jessica Rapson）^[63]使用“跨文化”一词来描述文化记忆超越国家、种族和宗教的界限，纪念场所突破政治、种族、语言或宗教的边界，成为我们理解过去的框架。中国人类学家王铭铭使用中文术语“天下”，这一最初用于表达皇帝统治疆域的概念。这一范畴处于国家和全球之间，不同的文化可以共存于其中。

近年来，中国博物馆学界更注重博物馆的本土发展，而非简单引进欧美及日本模式^[64]。这一趋势不仅体现在对中国博物馆史的细致梳理，也体现在当代中国的博物馆实践中。在审视中国博物馆学对英国博物馆学的影响时，我试图探讨跨文化发展的可能性，这将为英国博物馆学开辟新的道路。与其探究中国博物馆学如何被英国博物馆学所塑造，不如通过一个历史案例和一个当代案例，来审视中国博物馆学如何影响英国博物馆学。

1935—1936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艺术预展及随后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对中国物质文化分类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展览的创立背景揭示了展览促进跨文化对

话交流的潜力。该展览的缘起是孙科、蔡元培和林语堂等文化社会名流的构想，又有以斐西瓦乐·大卫（Percival David）为首的一群欧洲汉学爱好者共同推动。当时正值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前夜，这些知识分子旨在通过展示中国艺术，促进欧洲对中国艺术的欣赏，进而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地位的支持。展览尤其致力于改变欧洲将中国艺术视为“奇珍”的观念，通过相对完整的时间线索，向欧洲公众讲述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与文化价值，在此过程中，以时间为线索的叙事方法在创造这种价值时起到了关键作用^[65]。

展览在上海和伦敦以两种不同形式呈现，反映了策展团队的观点及其对中国艺术更广泛价值体系的认识。在上海展览中，展品被分为书画、青铜器、陶瓷和工艺品四大类，分布于七个展厅内，并设置了明确的展线，展品按照其艺术价值的高低进行等级排列，以构建“中国文明的视觉叙事”，其中，书法和绘画因其自唐代以来的主流收藏地位而备受瞩目。相比之下，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展览中，陶瓷占据了优先位置，因为这是欧洲人最为珍视的中国物质文化，他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接触到从中国进口的瓷器。

中国与欧洲在对艺术分类方法上的差异，通过上海和伦敦的展览中对历史线索的重视或忽视进一步凸显。在上海展览中，书画按年代排序，陶瓷的分类则进一步细化到窑址。这种排序方式展示了中国陶瓷从朴素单色到色彩斑斓、装饰精美的发展进程。在伦敦展览中，英国策展人则将同期同色系的陶瓷集中摆放。分类上的差异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布展思路：英国侧重于作品的美学特质，而中国则更强调其生产来源和历史地位。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场展览是在彼此对话的氛围中展开的，它们各自保留了其对中国文化侧重点的不同认识，但通过对话相互影响。这种关系并非毫无问题，英国展览从根本上误解了中国物质文化的价值，无论是策展人还是中国观众皆有此感。尽管如此，它代表了文化交流与理解的重要时刻，并实现了中方设定的目标：从此，在英国机构和公众眼中，中国物质文化



不仅仅是奇珍，而且是艺术。至今，在英国，许多对中国艺术品的展示至今仍沿用当年伦敦展览所建立的叙事结构。

现在让我们再举一个当代的例子：钟珞筠对中国观众和英国观众在关于“自鸣钟”的叙事偏好上的研究^[66]。钟表在英中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是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外交礼物^①。然而，尽管当时中英贸易中确实存在不平衡，钟表却是中国乐于进口且热衷仿制的英国产品之一，尤其在广州、北京和苏州等地。钟珞筠还指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钟表的感知存在差异。对于故宫的观众而言，这些钟表被视为“展示的珍宝”和皇帝的收藏^[66]。相比之下，在伦敦科学博物馆，通过对目标观众的调查发现，观众对钟表的工作原理及其英国制造者，如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表现出浓厚兴趣。在文化背景之外，钟珞筠还指出主办场地和环境在影响观众反应方面扮演的角色：故宫作为皇帝的居所，其历史背景与科学博物馆形成鲜明对比，这些都影响着参观者对钟表的感知。

在策划此次展览时，科学博物馆不仅意在满足观众期待，以英国视角聚焦展品，更希望超越观众预期，拓宽观众视野，使其思考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同一物的理解有何不同。为此，展览不仅展现了英国华裔社区对钟表的理解，还运用了新博物馆学方法。本文以新博物馆学开始，作为呼应，将以对中国新博物馆学的一些思考作为结尾。这些思考体现在展览“女神的装备”中。在本文第一部分，我阐述了英国新博物馆学如何以其对观众接受度的关注，来回应旧博物馆学对藏品灵韵的热衷。中国的新博物馆学亦可视为一种回应，但针对的是不同的事物。其表现在于：一方面试图突破线性束缚，这

不仅表现在叙事线索和参观路线上，还在借鉴了受苏联影响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博物馆学中的“墙上教科书”方法^{②[67]}上；另一方面则在于寻找内在博物馆学模式的冲动，张颂仁和高世名认为，中国传统的文人聚会“雅集”实际上为中国提供了展示和接触物品的本土模式。

这种用于展览的花园模式，对从内部发展中国博物馆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早在张謇创建南通博物苑时便可见一斑，他巧妙地融合了欧美博物馆模式与中国传统园林风格^[68]。在中国新博物馆学倡导的“花园式”展览中，如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2018年举办的“女神的装备”，同样可见其踪迹。这些展览通过非线性路径布局、极简风格以及不同时期物品的并置，既营造了在中国园林蜿蜒小径间行走的体验，也折射出网民在网络世界中随意浏览的轨迹^[69]。

作为与伦敦科学博物馆自鸣钟展览配套的“时间与文化的交流”项目的一部分，这一项目采用当代雅集形式，旨在探讨跨文化的时间概念。通过这一形式，项目试图借鉴当代中国新博物馆学的主题，探讨其如何颠覆英国博物馆学的传统叙事与流程，进而形成一种融合的新形态。其核心理念在于，雅集活动颠覆了欧洲艺术博物馆的被动消费模式，转而通过参与者自身的创意产出与物质文化互动。在传统雅集中，这种互动可能表现为诗歌创作、画作临摹或钤盖印章。而在“时间与文化的交流”雅集活动中，这一形式则转化为围绕展品的游戏创作、汉服复古时尚展览巡游、受钟声启发的音乐创作，以及制作适合中国社交媒体传播的网红风格视频。

这些雅集活动汇聚了三个不同群体：英国华

① 该使团旨在在北京建立英国大使馆，并以乾隆皇帝给乔治三世的回信而闻名：“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马戛尔尼使团是英国1792年派遣到中国的一个外交使团，由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伯爵率领。该使团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扩大英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并试图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使团带着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国书和大量礼物从英国朴茨茅斯港启航，于1793年到达中国。

② 译者注：指采用教科书式的内容体系，大量征引文献、补充说明文字、创作美术作品、罗列辅助展品的展陈方式。

裔社群、东亚侨民学生以及伦敦本土创意人才。此举旨在促进本地社群与国际社群之间的对话交流。通过这一过程，探索了时间的跨文化本质及其在不同文化中的构建方式。这一理念在展品中得到了体现，它们将欧洲制造的机械结构与中国宇宙观相结合。位于伦敦科学博物馆内的这场展览，之所以脱颖而出，不仅在于它是在科技氛围浓厚的场所举办的艺术展览，更因为它呈现了一种与观众以往所见迥异的博物馆学形式。这并非纯粹的中国式或英国式博物馆学，而是一种跨文化的、混合的、介于两者之间的独特存在。

中英博物馆学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仅仅是众多

可探索的线索之一，能够推动英国构建更为广阔的跨文化博物馆学，从而实现价值观的双重视角探索。有观点认为，这一线索或可为处理两种倾向的英国博物馆学提供进路：一是注重社会公正、聚焦本国公民的内向型博物馆学；二是专注于去殖民化与文物返还的外向型博物馆学。事实上，这种英国博物馆学的价值在于拓展了“英国性”的内涵，进而更深入地理解塑造其历史的其他文化并与其对话。

附记：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力生助理教授推荐稿件并提供诸多帮助！

参考文献

- [1] HALL S. Whose heritage? Un-settling the heritage, re-imaging the post-nation[M]//LITTER J, NAIDOO R.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the legacies of "Race", London: Routledge, 2005: 23.
- [2] POULOT D. The French museology[M]//POULOT D, STANKOVIĆ I. Discussing heritage and museums: crossing paths of France and Serbia, choice of articles from the summer school of museology proceedings. Paris: Website of HICSA, 2017: 7-30.
- [3] LABADI S. The national museum of immigration history (Paris, France), neo-colonialist representations, silencing, and re-appropriation[J]. Journal of Social Archaeology, 2013, 13(3): 310-330.
- [4] 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SEIDMAN S, ALEXANDER J, et al. The new social theory read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282-288.
- [5] FEUCHTWANG S, ROWLANDS M. Civilisation recast: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6] BUTLER B. Heritage as pharmakon and the muses as deconstruction: problematising curative museologies and heritage healing[M]//DUDLEY S, BARNES A, BINNIE J, et al. The thing about museum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354-371.
- [7] VERGO P. The new museology[M].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89.
- [8] MARSTINE J. New museum theory and practice: an introduction[M].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08: 5.
- [9] MILES R, ALT M, GOSLING D, et al. The design of educational exhibits[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10] KRSTOVIĆ N. Colonizing knowledge: new museology as museology of news[J]. Prace Etnograficzne, 2020, 48(2): 125-139.
- [11] SOARES B. Decolonising the museum? Community experiences in the periphery of the ICOM museum definition[J]. 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 2021, 64(3): 439-455.
- [12] WITCOMB A, Buckley K. Engaging with the future of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looking back in order to look forwar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3, 19(6): 562-578.
- [13] BUTLER B. Return to Alexandria: an ethnography of cultural heritage revivalism and museum memory[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 [14] BAZIN G. From the museum age[M]//CARBONELL B. Museum studies: an anthology of contexts.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Pub, 1967: 15-22.
- [15] JENKINS I. Archaeologists & aesthetes in the sculpture galleri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800-1939[M]. British Museum Pubns Ltd, 1992.



- [16] BANN S. 2008. The return to curiosity: shifting paradigms[M]//McClellan A. Art and its publics: museum studies at the Millennium.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Pub, 2003: 117-132.
- [17] BOWRY S. Re-thinking the curiosity cabinet: a study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 in early and post modernity[D]. Leicester: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2015.
- [18] BENJAMIN W.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M]//BENJAMIN W.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217-252.
- [19] DELBOURGO J. Collecting the world: the life and curiosity of Hans Sloane[M]. Penguin UK, 2017.
- [20] BLACK B. On exhibit. Victorians and their museums[M].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 [21] HILL K. Culture and class in English public museums, 1850-1914[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 [22] WHITEHEAD C. Museum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s: art and archaeolog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3.
- [23] BENNETT T. The birth of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M]. London: Routledge, 1995.
- [24] DEWEY J. Democracy in education[J].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1903, 4(4): 193-204.
- [25] CAMERON D. The museum, a temple or the forum[M]//ANDERSON G. Reinventing the museum: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the paradigm shift. Lanham, MD: AltaMira Press, 2004: 61-73.
- [26] SERRELL B. Paying attention: visitors and museum exhibitions[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1998.
- [27] MOUSSOURI T. Museum learning: theory and research as tools for enhancing practice[M].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 [28] SANDELL R. Museums as agents of social inclusion[J].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1998, 17(4): 401-418.
- [29] WATSON S. Museums and their communities[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4.
- [30] SIMON N. The participatory museum[M]. Santa Cruz, CA: Museum 2.0, 2010.
- [31] MCSWEENEY K, KAVANAGH J. Museum participation: new directions for audience collaboration[M]. Museums, 2016.
- [32] CROOKE E. The "active museum"[M]//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s of museum studies: museum practic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5: 481-498.
- [33] SANDELL R. Social inclusion, the museum and the dynamics of sectoral change[J]. Museum & Society, 2015, 1(1): 45-62.
- [34] IERVOLINO S. Museums, trans youth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ransforming heritage institutions through collaborative practice[M]//WATSON S, BARNES A, BUNNING K. A museum studies approach to heritag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664-685.
- [35] CROSSLEY L. Feeling the squeeze and doing it anyway: community engagement in English museums 2013-2014[D]. Leicester: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2018.
- [36] STEVENSON A. Artefacts of excavatio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Egyptian finds to museums, 1880-1915[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ollections, 2014, 26(1): 89-102.
- [37] BYRON G.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 book 1 and 2[M]. London: Blackie, 1813.
- [38] HITCHENS C, BROWNING R, BINNS G. The Elgin Marbles: should they be returned to Greece?[M]. London: Verso, 1997.
- [39] NTAFOU C. The new Acropolis Museum and the dynamics of national museum development in Greece[M]//POULOT D, BODENSTEIN F, GUIRAL J. Great narratives of the past: traditions and revisions in national museums. Linköping: Linköping University Electronic Press, 2011: 97-111.
- [40] CUNO J. Museums matter: in praise of the encyclopedic museum[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 [41] ABUNGU G. The declaration: a contested issue[J]. ICOM News, 2014(1): 5.
- [42] COLE T. After the fall, where? Relocating the Colston statue in Bristol, from 2020 to imaginary futures[J].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23, 82: 156-168.
- [43] DELBOURGO J. Collecting the world: the life and curiosity of Hans Sloane[M]. London: Penguin UK, 2017.
- [44] FOWLER C. Green unpleasant land: creative responses to rural England's colonial connections[M]. London: Peepal Tree Press, 2021.
- [45] HICKS D. The brutish museums: the Benin bronzes, colonial violence and cultural restitution[M]. London: Pluto Press, 2020: 4.
- [46] KUPER A. The museum of other people: from colonial acquisitions to cosmopolitan exhibitions[M]. Pantheon: Profile Books Ltd, 2024.
- [47] BOAST R. Neocolonial collaboration: museum as contact zone revisited[J]. Museum Anthropology, 2011, 34(1): 56-70.



- [48] LABADI S. The national museum of immigration history (Paris, France), neo-colonialist representations, silencing, and re-appropriation[J]. *Journal of Social Archaeology*, 2013, 13(3): 310–330.
- [49] NEUMANN B, ZIEROLD M. Cultural memory and memory cultures[M]//NEUMANN B, NÜNNING A. *Travelling concepts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2012: 225–248.
- [50] PENNY H. In Humboldt's shadow: a tragic history of German ethnolog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 [51] MACDONALD S. Perspectivity and anthropological engagements in heritage-making: challenges from the Humboldt Forum, Berlin[M]//Gilberthorpe 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challeng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24.
- [52] JENKINS I. *Archaeologists & aesthetes in the sculpture galleri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800–1939*[M]. British Museum Pubns Ltd, 1992.
- [53] BRYANT M.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the pedimental sculpture of the British Museum by Richard Westmacott[J]. *Sculpture Journal*, 2016, 25(3): 315–327.
- [54] HARRELL S. The history of the Yi[M]//*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63–91.
- [55] MACK J. Antiquities and the public: the expanding museum[M]//CAYGILL M, CHERRY J. A.W. *Franks: nineteenth-century collecting and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7.
- [56] CHAPMAN W. Pitt Rivers' attitude to the British Museum[D]//W. Chapman's unpublished D. Phil thesis, 1981.
- [57] SHELTON A. Museums and anthropologies: practices and narratives[M]//MACDONALD S.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 Oxford: Blackwell, 2006: 64–80.
- [58] SPRING C. A way of life: considering and curating the Sainsbury Africa galleries[D]. United Kingdom: Middlesex University, 2015.
- [59] DEAN C. The trouble with (the term) art[J]. *Art Journal*, 2006, 65(2): 24–32.
- [60] BOATCĂ M. Forgotten Europes[M]//CAIRO H, BRINGEL B. *Critical geopolitics and regional (Re) configurations: interregionalism and transnationalism between Latin America and Europ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96–116.
- [61] MALINOWSKI B.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an account of native enterprise and adventure in the archipelagoes of Melanesian New Guinea*[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 [62] RUSSELL B. The problem of China[M].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1922: 3.
- [63] BOND L, RAPSON J. The transcultural turn: interrogating memory between and beyond borders[M]. De Gruyter, 2014.
- [64] CHANG T, GAO S. Yaji Garden: art under the sky[M]//MACLEOD S, AUSTIN T, HALE J, et al. *The future of museum and gallery design*. London: Routledge, 2018.
- [65] FAN L. The 1935 Londo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the China critic reacts[J].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Nos. 30/31 June/Sept 2012.
- [66] CHUNG C. Time, culture and identity: exploring horological collections with UK–China museum audiences[J]. *Chinese Annal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0(4): 82.
- [67] CHEN C. Discussion on several relations th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Ancient China” Basic Display deals with[M]//China Museum Association and Chinese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Retrospect and Innovation: 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f Museum Display*. Nanjing: Yilin Publishing House, 2014.
- [68] SHAO Q. Exhibiting the modern: the cre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museum, 1905–1930[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4, 179: 684–702.
- [69] FRANCIS D. Tracing the lineage of linear exhibition narratives in Chinese museology[M]//CAI Y. *The museum in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5.